



百年来,中国文学在党的领导下不断繁荣发展,涌现了许多讴歌党和人民的伟大壮举与光辉事迹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品虽然诞生在不同的时期,但都始终植根于历史上光荣而伟大的革命传统与改革实践,更葆有对党和人民的深切热爱。这其中,新中国成立初期所涌现的一大批红色经典,堪称最直接最生动地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而走向胜利的伟大事迹。作家冯志在1958年定稿完成并出版的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敌后武工队》再现了冀中地区武工队的抗日英雄传奇,重点突出了小队队长魏强带领刘太生、贾正等人在敌占区抗击日伪人员并最终取得胜利的英雄事迹。小说问世以来,凭借着通俗易懂的语言、跌宕起伏故事情节和强烈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获得了批评家和无数读者的赞誉。在我看来,《敌后武工队》虽然借助了传统通俗小说的某些元素,但其表现内容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侠义公案小说,而是讲述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故事。这种“现代性”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我们的革命事业始终有着现代的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敌后武工队》的开局即交代了小说的时代背景。1942年5月1日,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遭到敌军残酷的“五一”大扫荡。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事实,主力部队不得不暂时离开冀中,朝着山区转移。虽然冀中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但人们战胜敌人的信心依然高涨,“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在哪里灭亡”。魏强和贾正这两个在冀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知道自己有多么大:“一切都是暂时的,要把它变过来!”“有咱们的党,有我们的军队,有冀中的人民,咱们一定叫它变!”所以,当魏强听到分区党委决定派自己到武工队担任小队队长时,他的内心既高兴又胆怯:高兴的是,党对自己如此信任,让自己担负这么重大的任务,觉得万分光荣,但又担心自己完不成党给予的光荣任务。但是,“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在共产党员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个担忧很快就消失了,魏强毅然投身到武工队的抗日斗争中,开展工作,发动群众,打击敌人。

小说借助参谋长的指令传达了敌后武工队的主要性质:“根据咱冀中现在的环境,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们要抽调一部分具有一定战斗经验和文化程度,能掌握和贯彻党的各种政策的优秀的共产党员,组织一支短小精悍的武装工作队,去开辟敌占区。”敌后武工队远离根据地,环境恶劣,任务艰巨,不仅要配合主力部队进行武装斗争,粉碎敌人的各种扫荡,还肩负着放手发动人民

群众,对敌伪展开政治攻势的任务。这就意味着,敌后武工队的成员要接受军队和党的双重领导,不仅要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而且要能贯彻宣传党的政策文件,尽可能地动员广大群众支援抗战。

因此,敌后武工队既要在组织和思想上坚持党的领导,也要与人民群众保持良好的关系,切实为群众的利益着想,真正依靠人民群众来消灭敌人。事实上,敌后武工队真正做到了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在群众基础好的地区,武工队隐蔽在群众家中,随时寻找敌人的漏洞,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与此同时,抗日群众自发为武工队成员站岗放哨,时刻掩护武工队员的身份不致暴露。这种良好的军民关系,归根结底源于武工队为人民服务的方针,真正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尽最大可能保障战争条件下人民群众的安危。这也就解释了我们的武工队为何会得到广大抗日民众发自内心的爱戴。

正是因为坚持了党的领导和密切联系群众的路线,武工队的工作才会开展得游刃有余。由于敌我力量的差距过于悬殊,武工队的斗争往往采取迂回渐进的方式开展。比如,巧妙利用敌我矛盾,并制造新的矛盾,从内部瓦解敌人。因此,当魏强、刘文彬听说铁杆汉奸刘魁胜和南关车站副段长万士顺为妓女争风吃醋打架斗殴的事情之后,就利用这个矛盾,带领武工队化装成夜袭队,机智勇敢地闯入保定南关火车站,打死了万士顺和守卫的日本兵,挑起了日本宪兵队副队长坂本少佐对刘魁胜的极度不满,坂本最终带领部下连夜围攻夜袭队。这出让敌人自相残杀的好戏,正是利用了敌伪内部人员之间的矛盾,不仅真正打击了敌人,还挫减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其对武工队更加惧怕。

在对待抗日中持不同态度的人群,武工队也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待广大的人民群众,武工队全心全意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危,真正做到了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在凶残的敌人和特务汉奸面前,武工队则是毫不留情地惩戒打击;而对于那些可以争取的力量,武工队则是尽可能地发展统一战线中的同盟军,把他们也吸纳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比如,在小说中,在落实党的土地政策时,武工队对待范村的地主周敬之,并没有一味地采取镇压的办法,而是通过反复劝说的方式,促使他减租减息,减轻农民的负担;再有,即便是对待已经加入敌军夜袭队的梁帮,也因为他不至罪大恶极,而劝说他弃暗投明。

这种对待敌我态度鲜明的工作作风,使得武工队成为真正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力量,打击敌人的革命武装。武工队密切联系群众

城乡叙事的时代成像

——陈仓《止痛药》简评 □周荣

外地口音、高楼脚手架上没有面目的身影——他们是制造城市繁荣景象却几乎无暇欣赏、保证城市良性运行却无法融入秩序的群体,他们又远离时代机遇,远离社会红利。这也是这个时代令人无比感伤的故事,一个如骆驼祥子般真诚淳朴善良的农村青年在百年后依然难逃阶层的宿命,而比陈元们似乎更幸运的凤凰男尚且难逃中产阶级口味的挑剔与苛责。这是今天的日常生活、价值准则与集体记忆,也是文本逻辑成立、禁得住反复推敲的现实基础。但另一方面,我们纵然对陈元与凤妹的爱情万般唏嘘,对陈元的死心痛不已,对凤妹和其母的薄情势利愤慨无比,却无法否认,至此小说的展开还是建立于城乡二元对立的认知方式上,延续着“乡村人进城”叙事的基本模式,暂时还没有提供超出《子夜》《骆驼祥子》的思想视野和价值维度。

《止痛药》采用双线交叉叙事支撑起“两地三人”的故事情节——陈元和凤妹在大庙村的日常生活、陈元与凤妹在上海的短暂爱情。不得不说,用这种叙事方式撑起长篇小说是有一些风险的,需要通过或精巧的叙事技艺、或饱满的思想张力、或出人意料的语言意象,平衡“极简”叙事可能带来的单薄、平面,尤其在小说日趋复杂化的当下。乌里·希克这个非重要人物的设置,完成了小说的平衡术,更重要的是,于城乡二元对立认知之外,拓展出新的思想视野。乌里·希克是一个有瑞士国籍的纯正中国人,其貌不扬又行为猥琐、举止轻浮,凤妹并不喜欢希克,但凤妹母亲极力促成这桩婚事,甚至不惜把女儿和希克反锁在一个房间。希克毫不出色,凤妹母亲看重的是那个瑞士国籍。有了瑞士国籍,结婚后就可以是外国人,生下来孩子就直接是外国人。外国人高于上海人的身份,正如上海人高于乡下人。陈元—凤妹—乌里·希克构成的身份等级链条由中国城乡内部之间,延续到中国与世界之间,演变成世界性的普遍等级观念。改革开放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国门,国人争相走出国门;而新时期文学之初,《人生》《陈奂生上城》引起巨大轰动,两部小说分别讲述了知识分子高加林和农民陈奂生进城的故事。彼时,国外/城市是自由、包容、民主,充满无限活力与可能的象征。而新世纪后,作家很难再想象一个黄金世界,给出关于生活无限活力无限

——《敌后武工队》的启示

□杨毅

“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只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的军队就会战无不胜。这个看似朴素但颠扑不破的道理,不仅是党领导革命斗争所取得的伟大经验,也同样适用于和平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

的做法,也反过来使得群众的利益得到保障。因此,当敌占区的群众苦于日军对百姓的残酷统治,他们热烈盼望的就是武工队的到来,甚至还出现了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愿出卖武工队员的壮举。这是因为,只有武工队才能让他们过上相对安稳的生活。因此,当武工队最终消灭了祸国殃民的敌伪人员,群众的喜悦是发自内心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打死侯扒皮,摆酒吃顿席;打死刘魁胜,家家把酒敬;打死老松田,重新过大年。”

所以,《敌后武工队》所着力刻画的主人公魏强并不是杨子荣式的勇闯敌营的孤胆英雄,而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带领整个小队取得胜利的平民英雄。整个敌后武工队正是中国共产党在特殊的战争年代,立足中国具体实际所做出的伟大创举。它既不同于以武装斗争为主要任务的游击队,更不同于西方样式的特种部队,而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真正依靠人民群众,采取各种方式对敌伪展开政治攻势的先锋利刃。总之,以敌后武工队为代表的抗日军队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军队,也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军队。用冯志自己的话说,他将《敌后武工队》“献给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献给勤劳的勇敢的坚强的人民!”

小说所着力表现的敌后武工队,不仅有着真实的历史基础,而且在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日军在华北地区集结重兵,不断蚕食扫荡着抗日根据地,为扭转不利局面,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各地组织武装宣传队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在1942年1月正式作出了关于建立武装工作队的决定,明确了武工队的组织编制、工作任务和斗争方式。同年8月,由40余名武工队员组成的冀中九分区武工队正式成立。担任武工队第一小队队长的,正是后来创作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的冯志。

冯志1923年出生在河北省静海县的一个贫农家庭。七七事变后,他怀着抗日救国的强烈愿



望参加了八路军,被分配到冀中军区第九分区政治部。1942年,他闻讯分区成立了敌后武装特别工作队,就积极报名参加,随后被任命为武工队第一小队队长。从此,他积极组织并充分依靠当地群众,带领队员们拔炮楼、杀鬼子、惩恶霸、除汉奸,运用各种机动灵活的方式打击敌人。亲身经历促使他想要写作《敌后武工队》,“我所以要写《敌后武工队》这部小说,是因为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日日夜夜地冲击着我的心”,“我总觉得如不写出来,在战友们面前似乎欠点什么,在祖国面前仿佛还有什么责任没尽到”。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三个月后,他就想把武工队的斗争生活写下来,但由于当时的文化水平不高,再加上蒋介石挑起了内战,写作的念头只得暂时放下,但“写它的意愿并没有打消”,直到解放战争取得胜利,便开始动手写这部小说。冯志说:“书中的人物,都是我熟悉的人物,有的是我的上级,有的是我



的战友,有的是我的‘堡垒’户;书中的事件,又多是我亲自参加的。在党的关怀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现在总算完成了我多年的夙愿,把它写出来了。”

1958年,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由于受到广大读者持续而热烈的欢迎,小说不仅多次再版,还先后被改编为评书、话剧、连环画、京剧、电影、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这些丰富多样的艺术类型,使其以更为通俗化的方式得到传播,同时印证了作品所具有的长久魅力。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社会思潮的变化,《敌后武工队》的改编史呼应了不同时期的时代症候与文化想象,而呈现出更加多元的内容和价值取向,但始终不变的是作为经典本身的革命底色和持久的文化感召力。

如今看来,《敌后武工队》经久不衰的原因,不仅在于故事本身的精彩,更重要的是它所蕴含的永不言败的革命信念。《敌后武工队》不仅再现了抗战时期冀中武工队对敌作战的智勇双全,也更加突出斗争中所坚守的必胜信念: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始终没有动摇。这种毫不动摇的信念正是来自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群众虽然在苦难中过活,抗战必胜的信念确实都在心里扎下了根。有党的领导,有胜利信心十足的群众支持,环境即使再残酷,也能坚持下去,搞出个名堂来。”也就是说,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只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的军队就会战无不胜。这个看似朴素但颠扑不破的道理,不仅是党领导革命斗争所取得的伟大经验,也同样适用于和平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

短评

赵淑萍新作《十里红妆》中收录了60篇微型小说,集中展示了她勤奋创作的阶段性成果。在这里,赵淑萍为读者精心建构了一个身份繁杂、姿态迥异的人物长廊。其中的人物既有医生、弹花匠、演员、戏迷、人险师、裁缝、画家、尼姑、书生、面点师、泥水匠、理发师、智障儿童,又有奶奶、三爹、男人(丈夫)、女人(妻子)、儿子、妈妈、邻居、父亲、爷爷、堂兄……无论是社会身份还是家庭身份,这些人无不个性鲜明,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各色人等大都生活在城市与乡村的寻常巷陌间,似乎是你童年时代见过的一个人,似乎是你从长辈那里听来的一个人,似乎是你邻家的那个人,总之,似乎打你的生活中悄然经过。赵淑萍笔下的人物让你有似曾相识之感,除了走心入情的文笔塑造之外,还因她描摹的人物大都处于生活的基层,大多读者面对她笔下的人物时,不隔膜,不贴脚,两者处于平视的对等地位,且近到似乎能闻到他家里的炊烟气息,人生况味相同,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容易产生共鸣。

《十里红妆》集中大部分微型小说,很少有大开大合的情节设置,很少有激烈的矛盾冲突,作者用这种并不“讨巧”的笔触描绘日常生活图景,看似平常,实则棋走险着,一不留意,日常生活或许就被描绘得稀松平常,难软成一塌糊涂的糖稀,因此,对写作功力是一种严峻考验。但赵淑萍笔下对日常生活的描摹,让我们看到了万花筒般的五彩斑斓。一个懒得给女人买花的男人,居然爱上了种花(《种花的男人》);一对无法共同生活而离异的冤家,在演出中居然是无人能替代的最佳搭档(《最佳搭档》);一对携手走入老年的恩爱夫妻,内疚多年的妻子向丈夫坦白,为了和他结合,她曾经堵住了他人生的罗马大道(《码头》)……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赵淑萍总能精准地点到拨弄全局的穴位,向读者呈现出引人入胜的花样年华来。从赵淑萍的小说中,我们也可以感知诸多文化与艺术在其作品中融合共生,从地方戏曲、服饰(旗袍、裙子)到历史、美术、书法等等,这些元素的揉入,滋养了赵淑萍小说底蕴丰厚的文气。当然,并不是你想叫什么元素介入就能介入的,首先,你得懂,才能用得得心应手、恰如其分。在网上看过赵淑萍的其他作品,有相当多的文章是戏剧评论、文史考证,她本人也是硬笔书法家,可见,在文学创作之外,她在其他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并把其他地方的收获反馈到文学创作之中。

毋庸置疑,赵淑萍《十里红妆》精选集,内中的微型小说可以说是好看的。不仅好看,当我们用更为繁复严谨的指标去衡量她这本集中的作品时,会发现,从第一篇到最后,60篇作品串起的一条流经低处的日常的生活之长河,粼粼河水是如此清澈,朵朵浪花是那么圣洁。赵淑萍笔下,有相恋20年不顾20岁差距终修成正果的圆满的爱情故事(《礁石上的少女》),有大半生执著寻找战友遗骨和他家乡的感人至深的故事(《四明山心》),有绝不掺假只靠手艺挣钱的生意人的诚信故事(《馒头王》),有旁观屠戮却不出手相救致致官司的劝人向善的故事(《看客》),更有以《弹花匠和他的女人》《摘下你的墨镜》《十里红妆》为代表的温暖、和谐的故事,亦有部分篇章涉及节约(《米殇》)、环保(《河上的男人》)等重大社会问题……言为心声,从一篇篇不含杂质的良心之作中,你会读出作者对低处的日常生活的一往情深,读出作者的一片晶莹剔透的冰心,感知到作者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

不过,在阅读《十里红妆》时,我感觉有个别篇章,可能是取材于真人真事,写作时流于表面,缺乏深度挖掘,再现原型人物时缺乏艺术性。以真人为原型创作小说,一定要处理好“近”与“远”的辩证关系,要让小说塑造的人物与原型保持一定的距离:太近了,紧贴着原型人物写,就是非虚构了;太远了,就达不到为原型塑造艺术形象的目的了。

第一感受

陈仓近年的小说创作游走在城乡之间,《父亲进城》《女儿进城》《麦子进城》系列作品在“乡下人进城”叙事模式下对城乡冲突进行了深度、不懈地开掘,《止痛药》延续了这样的创作路径:在城乡的碰撞冲突中勘探时代难题、社会症结以及生存的困境。

几乎很少有作家的写作可以溢出文学史的范畴,仅仅因为自身写作而获得意义;也几乎没有一个文本能够挣脱文学史的阐释谱系而天然地、孤立地获得意义。每一种写作都是在传统肌脉上的延伸,都是与传统对话的回声,无论是激烈反传统的写作还是承续传统的写作,都在感受传统力量的直接、强大的支配和制约。“乡下人进城”的故事从现代文学之初延续至今,已经讲述了百余年,悠长的历史积淀强化了叙事的有效性,也搭建了丰厚的言说空间。这是后来者写作不得不对话的强大“传统”,也是阐释文本的必要参照。从《阿Q正传》到《子夜》,再到《骆驼祥子》,在由乡村/传统/落后向城市/现代/先进更迭、进化的路径上,“乡下人进城”叙事所言说的经验是对现代中国核心命题的回应,也构成了一条考察百年中国文学的有效线索。历史在现时代性强大马力助推下,驶出了悠长平缓的乡土轨道,驶入瞬息万变、喧嚣浮华的城市轨道。“乡下人进城”叙事的另外一种张力还来自于文学与历史、虚构与想象、认知与审美、文本与文本之间搭建的层叠交错的意义空间。

将《止痛药》置于这样的叙事谱系中,除却时代的痕迹与风气,可以明显感受到作家对这个百年不易主题的延伸思考与奋力超越,也可以感受到受制于叙事传统的保守与拘谨。甚至不妨说,对小说的理解已经不取决于文本自身,而取决于如何基于社会历史与文学传统,整体地而非断裂地、统一地而非对立地理解时代、理解城乡。《止痛药》的人物性格、情节意象、情感基调都不复杂,一眼望去如大地般平实质朴明晰。小说在“离去—归来”结构链条中讲述了陕西农村青年陈元怀着梦想来到上海,在经历身份、爱情、财富上的挫败后,带着难以言说的心灵痛楚和肉体伤痕,黯然离开大城市返回家乡的经历。毫无疑问,这是这个时代极具代表性的人物,穿梭于城市缝隙的骑手、清晨早餐摊上浓重的

日常生活向善表达
——评赵淑萍《十里红妆》
□张琳